“80后”大医生：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当医生

据新华社长春8月18日电（记者赵丹丹）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有位人见人爱的“80后”医生。同事说她是科室之“宝”，患者说她是仁术仁医，学生说她是慈母严师。她自己却谦虚地说，“我得向大家学习，因为我是80后’。”

这位谦虚又可爱的“80后”，就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神经内科教授、博士生导师饶明俐。86岁高龄的她，从1955年开始从医，至今已经63年。如今，她依然工作在临床和教学一线。

平等仁爱，患者至上

在首届中国医师节前夕，记者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见到了饶明俐教授。别看饶老年事已高，但口齿伶俐、头脑清晰、行动轻便。手里拿着最新款智能手机，见了面就与记者通过“扫一扫”加了微信好友。

除了思维方式紧跟时代，饶老的工作量也丝毫不输年轻人。她告诉记者，自己每天5点钟起床，6点20时准时出门，7点前就到单位。如果是出诊日，她就会早早地到诊室等着病人。“有些外地来的病人，我争取一天把病给他看利索，当天就回去。不然的话病人在这过夜、吃饭，都是花销，要尽可能地减少患者的支出。”饶明俐说。

一位经常跟饶明俐出诊的导诊护士告诉记者，饶教授面对每位前来就诊的患者，都十分亲切、和蔼，就像一位老奶奶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不论是问诊、看片还是查体，饶教授都非常认真仔细，最后也会耐心地给患者讲解病情，告知如何用药、如何锻炼。“不论患者进来的时候什么样，但凡是从饶教授诊室出去的，都特别乐呵。”护士说。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护士长颜秀丽告诉记者，有一次，一位患者来找饶教授看病，整整一个行李箱内装的全是这位患者在全国各个医院的求医病例。饶教授让患者先去做检查，把资料留下，利用中午时间看完资料，这样患者下午来，就能准确地进行诊断。“饶教授经常为了多给患者看一会儿病，中午就在办公室对付一点面包、饼干。还总是笑呵呵地说，我吃这个就可以了。”颜秀丽说。

“很多病人到医院来都很恐惧，所以医生尽量多花点时间，帮病人解释清楚，这样他不害怕了，病也好了一半。我看着病人高兴，那我比他还高兴。”饶明俐眯着眼睛咯咯地笑着说。

精进审慎，终身学习

86岁的饶明俐早已荣誉加身。她是白求恩医科大学临床专业的第一位研究生，曾任白求恩医科大学副校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中国卒中学会第一届终身成就奖，主编或参编专著近30部，担任全国20余份学术杂志顾问、编委或特约编委，多年前就成为业内泰斗。她的学生遍布全国，现在科室内就有很多她的学生、“学孙”、甚至是学“重孙”，可谓医界的“四世同堂”。

每周三是全科固定的会诊日，一周的疑难杂症都要拿到会上讨论。只要不出差，饶明俐一定会参加。全神贯注地听完汇报，饶明俐会结合疾病的发展历史、自身的临床经验，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并提出独到见解。精彩的发言常常引来大家的掌声，饶明俐也常常高兴得笑弯了眼睛。“能把一辈子的经验传承下去，我很高兴。”饶明俐说。

在饶明俐的办公室，一摞摞厚厚的稿件待审。只要一有空，饶明俐就戴上花镜，拿着铅笔和长格尺，逐字逐句审阅、修改起来。饶明俐告诉记者，她目前依然是《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实质上的主编，每期都有大量的来稿需要编审。“虽然工作量不小，但从来稿中，我能得知目前全国各地都在研究什么，有什么新发展，这对我来讲也是知识的更新。医学发展很快，不学习就会落后，所以这项工作我也做得很愉快。”饶明俐说。

大医精诚，尚美至善

“饶奶奶，我考上大学啦！谢谢你们让我重生。”饶明俐在微信里找到这段留言时，高兴得合不拢嘴。

饶明俐告诉记者，2015年，马上就要高考的圆圆突然抽风昏迷，送到医院时已经停止呼吸。经过紧急抢救，虽然维持了呼吸，但是持续发烧、昏迷，全身剥脱性皮炎，命悬一线。饶明俐请有关科室会诊，最终孩子被确诊为畸胎瘤。但是饶明俐没有放弃对她的治疗，每天都在研究治疗方案。经过手术和长期治疗，奇迹发生了，孩子的不良症状逐渐消退，2017年元旦开始恢复意识，慢慢能够自理、学习。在2018年的高考中，孩子取得不错的成绩，被大学录取。饶明俐在微信中这样回复她和家人：孩子的恢复，鼓舞了我们全科医务人员，要对病人如亲人，要不放弃一线希望抢救病人。也感谢你们永不放弃的精神，鼓舞着我们！

经饶明俐诊治的30多万患者中，像圆圆这样的故事，已经数不清了。甚至在大街上，还有很多患者亲切地和她打招呼。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当医生，真的很愉快，如果有下辈子，我还要当医生。”饶明俐说。

中国援非医疗惠及非洲民众

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8月18日电（记者李斯博、高竹）1963年，为响应阿尔及利亚医疗援助请求，中国政府组织国内优秀医疗力量，派出第一支援非医疗队。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援非医疗人员足迹遍布非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救治数以亿计非洲患者，为非洲培训数以万计医务人员。

援非初期，器材和药品短缺，中国医疗队与受援国医护人员一起制作必要设备和器械，因地制宜开展临床救治。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医疗队引进超声乳化白内障复明、心脏搭桥、内窥镜微创和关节置换手术等先进医疗技术，为受援国患者提供更广泛的医疗服务。

2014年西非暴发埃博拉疫情后，中国立即行动，帮助非洲兄弟抗击疫情，以实际行动体现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中非友好情谊。时任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说，在利比里亚人民遭遇埃博拉疫情时，中国率先伸出援手，唤起和引领国际社会关注与援助，为最终战胜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当地民众遇到中国面孔，总会热情地用斯瓦希里语喊“中国、中国”，或用中文说“你好”。在这里，中国医疗队已服务50多年，在当地刻下深深的中国印记。

“我是中国人！”每当遇见中国朋友，苏莱曼都会这么说。40多年前，苏莱曼的母亲哈桑女士生产时遭遇难产。在第九批中国援桑给巴尔医疗队妇产科医生杨伟文帮助下，苏莱曼顺利出生、母子平安。几乎每年，苏莱曼都要陪母亲去趟中国，看望早已退休的杨伟文医生。

在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中国医疗队为患者实施动静脉内瘘手术，被当地同事称为“创举”。此前，当地没有医生能做这种手术，患者按惯例只能转到南非。“这例手术成功意义非凡，仅这一例就为政府节省了20万普拉（约合2万美元）。博茨瓦纳就此类手术取得突破性成就，中国医生的援助比钻石还珍贵。”哈博罗内公主玛丽娜医院肾内科负责人谢赫说。

今年5月，中国援助赞比亚医疗队全体队员被授予“医疗合作勋章”。赞比亚卫生部长奇塔卢·奇卢菲亚说，中赞两国在卫生领域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中国援助对赞卫生部门基础设施和人员能力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6年，中国“光明行”医疗援助项目在刚果（布）启动，中国援刚果（布）医疗队眼科医生张卫鹏告诉记者，中刚友好医院是刚果（布）目前唯一能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医院，不少患者慕名而来。工作之余，张卫鹏还为当地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只有为医院培训眼科医生，让他们拥有独立开展白内障手术的专业能力，才能为当地留下一批‘不走的医疗队’，为当地民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针对非洲不同地区特殊疫情，中国派出一批批公共卫生领域专家，从源头上帮助当地民众摆脱疫情困扰。

2006年，科摩罗报告疟疾病例10.8万例，致死34人。2007年中国抗疟团队进驻科摩罗，到2014年，科全国报告疟疾病例仅2000多例，全面实现疟疾病例零死亡。

在坦桑尼亚奔巴岛，由中国政府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血吸虫病防治试点项目正在进行。2017年1月项目启动至今，中国专家克服资料少、感染风险高等困难，调查当地水塘和溪流，灭螺水塘面积达76万平方米。

奔巴岛热带病项目负责人萨利赫·穆罕默德说：“从项目开展到现在，中国专家一直和我们并肩作战，取得了很多成果。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奔巴岛会尽早告别血吸虫病。”　（参与记者：杨孟曦、彭立军、朱绍斌、王松宇）

乡村医生：用爱浇筑健康的防线

▲**大图：**江西省广昌县山下村乡村医生李彦走在乡间出诊的路上（4月17日摄）。李彦年少时曾被毒蛇咬伤，失去了左臂。但这并不妨碍他用药箱“连起”整个村庄，践行医者的诺言。**小图：**李彦在卫生站为村民检查身体（4月17日摄）。

今年8月19日是我国首个“中国医师节”。长期以来，在医疗条件欠发达的乡村地区，乡村医生群体克服艰苦和劳累，用爱和责任浇筑起群众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新华社记者胡晨欢摄**

超声科医师：在黑白影像中探寻人生华彩

据新华社兰州8月18日电（记者梁军）超声科常常是患者的第一道检查窗口。首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进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见到老中青三代超声科医师，记录他们在黑与白的影像世界中的探寻片段。

傍晚19时，二楼的超声科门前，依然人头攒动。“鼓肚子，憋住气”。在检查室，27岁的超声科医师杨璐璐身体右倾，单手拿着探头在患者腹部反复扫查，目光牢牢锁在床头的超声显示屏上。这个动作，从清晨上班开始，她足足保持了9个小时。

单位规定的下班时间是18时，但超声科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当天看门诊的病人，不管来多少，都要检查完再下班。“为了减少患者的等待时间，大家检查中途很少离场。宁肯渴着，不敢喝水，就怕上厕所离开椅子。”杨璐璐说，科室平均每天检查量在1400人次左右。

超声科医师以精准到位的诊断，才能帮助临床医生有的放矢。兰大二院超声科主任聂芳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约有超声医师20万人。他们利用超声波影像，扫描人体器官内的病变，可谓是临床医生的第三只“眼睛”。

为广大患者提供便利的同时，超声科医师长期待在光线昏暗的密闭室内，近距离观看仪器显示屏和电脑，保持一种姿态不动，除了近视、视疲劳、散光，很多人有颈椎病和肩周炎等职业疾病。

“不同于大多检查科室，我们既能通过影像诊断，又能当临床医生开展介入治疗。在这两种身份之间切换游走，我们觉得很享受。”从事超声专业已近20个年头，聂芳谈起超声医学，脸上满满都是自豪。

『死亡之海』旁的『光明天使』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8日电（记者顾煜、段敏夫）“韩叔叔，我终于可以和哥哥去上学了！”在新疆和田地区人民医院眼科门诊，前来复查的艾比布拉·穆太力普人未到声先至，向天津援疆眼科专家韩金栋汇报着这个好消息。

今年5岁的艾比布拉和双胞胎哥哥家住和田地区于田县巴什兰帕村，前不久艾比布拉在当地小学完成学前班报名，即将与哥哥一同踏入期盼已久的校园。

艾比布拉患有先天性白内障，只能分辨白天与黑夜，从来不知道他的妈妈是什么模样，每天只能和妈妈帕提古丽待在家里，羊圈里的小羔羊成了小艾比唯一的朋友。去年九月，兄弟俩到了学前教育入学年龄，顺利进入幼儿园就读。但没过几天，由于艾比布拉各方面都需要有人照顾，无法自理，只好退学。

“这几年带着他去了好多医院，都没有得到有效治疗。”不少医生都告诉帕提古丽，她儿子几乎没有复明的希望，今年4月，听说和田地区人民医院来了天津援疆的眼科专家，她抱着试试的态度带着孩子来了，经过了近3个月的漫长治疗，艾比布拉终于复明。

来疆近一年的韩金栋是天津市第二批“组团式”援疆专家之一，也是艾比布拉的主治医生。来疆伊始，他和老同学、同为援疆专家的李岩发现，位于“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缘的和田地区是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等眼病的高发区。过去，从和田地区人民医院到各县人民医院，都没有独立的眼科。“眼部小病去五官科看，大毛病就得去乌鲁木齐。”这让当地群众颇感苦恼。

在两人的主导下，2017年12月底，和田地区人民医院眼科成立。如今，和田地区人民医院眼科已发展为三级眼科专科。去年12月以来，在两人的精心治疗下，眼科完成和指导完成门诊诊疗12000人次，住院患者620人次，其中手术400例，内科治疗患者220例，百余名患者重见光明，两人也成为不少患者口中的“光明天使”。

走在眼科门诊内，墙上一面面锦旗、一封封感谢信，诉说着患者们重获光明的喜悦，也表达着对援疆医生的感激。

“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患者康复、当地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和认可是我们最大的安慰。”看着楼道内越来越多的康复患者，李岩和韩金栋相视一笑。

“中国医生是我家人”

记在赞比亚的中国医疗工作者

据新华社卢萨卡8月18日电（记者彭立军）“中国医生是我的家人、我的兄弟！”在中国向赞比亚派遣医疗队40周年纪念活动上，赞比亚影视制作人纳索·玛普兰嘎作为患者代表发言时这样说道。

两年前，玛普兰嘎因患有声带息肉几个月无法说话，来到中赞友好医院求医。第18批中国援赞医疗队耳鼻喉科医生高长辉为他实施了该院第一例支撑喉镜下喉重物切除手术，令他很快康复。“非常感谢中国政府对赞比亚的医疗援助。”玛普兰嘎说。

自1978年开始，中国政府向赞比亚共派出20批医疗队，546名医疗队员。他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在赞比亚诊治病人300多万人次，开展各类手术2万余台，引进、实施新技术和新项目700多项。为改善赞比亚的医疗卫生状况，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用自己的医术和职业操守在赞比亚谱写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83岁的龚梅灵经营着一家诊所，他曾是第7批和第9批援赞医疗队队员。“我在援赞医疗队工作4年多时间，深感赞比亚医疗条件落后，非常需要我们。于是在医疗队工作结束后，我决定留在赞比亚，开办了这家诊所，继续为赞比亚人民的健康服务。”龚梅灵说。

让龚梅灵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在1991年夏天，他作为第7批援赞医疗队副队长在铜带省汤姆逊医院工作。当时卢安夏地区突发霍乱疫情，由于霍乱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医院将病人集中安置在学校的教室、走廊和操场上。许多病人发生脱水、中毒、休克，情况危急。当时又正值雨季，病人的呕吐物等混合着雨水肆意流淌。他和同事们不顾个人安危，跪在地上为病人穿刺、输液、紧急抢救，连续奋战十多天。这一幕恰巧被赞比亚时任总统奇卢巴看到，他来到医疗队员身旁，对他们竖起大拇指。“遗憾的是，我的同事陈雅琴医师，由于疲劳过度，肝病复发，牺牲在与霍乱斗争的战场上。”龚梅灵说。

开办诊所21年来，龚梅灵接诊10万多人次，诊治了多种病症，他的医术和医德得到病人的认可和称赞。64岁的克里斯托弗·塞卡科勒是龚梅灵的病人，“我认识龚大夫已经10年了，他医术高超，药到病除。”

冯轲红是第10批和第11批援赞医疗队队员，目前她在卢萨卡市中心经营一家中医诊所。她的病人中既有普通百姓，也有第一夫人及总统府官员。一些当地病人在她的治疗过程中，慢慢接触和认可中医。

“作为一名中医，不仅仅是运用中医理论治病救人，也要弘扬中医文化，让更多赞比亚人了解中医、信任中医，这也是我的心愿。”冯轲红对记者说。

一名藏族医生的医师节“礼物”

据新华社西宁8月18日电（记者赵雅芳）“这是我在首个‘中国医师节’收到的最好的礼物。”17日，听到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关于扩建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项目审批通过的消息，索南巴久十分激动。他说，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扩建后，床位多了，医疗设备提升了，又能挽救更多的患儿。

36岁的索南巴久是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的儿科主任，从医已有13年。2005年，刚从大学毕业的索南巴久被分到玉树州人民医院儿科工作。那时，被称为“哑科”的儿科是玉树州人民医院的冷门科室，接诊量少，“又苦又累、风险大”也让大多数医生对儿科“敬而远之”。索南巴久成了当时儿科唯一的一位男医生。

“13张床位经常住不满，有时一天里就有两三个患儿没了命。”面对当时玉树州人民医院儿科的接诊情况和救治能力，年轻的索南巴久十分愁苦。他记得，很多次牧民抱着奄奄一息的孩子从上百公里外赶来医院，而医生却对病情束手无策，患儿家属也只能认命放弃。每次救治失败后，孩子被家属抱走了，但他整夜无法释怀。困惑、自责，但没有好的救治方法，他仍然挽救不了任何一个危重患儿。

索南巴久说，过去，玉树的医疗条件相对落后，当地的医务人员很少能学到新的救治理念和救治方法，尤其像新生儿救治这样的新兴学科更是长期空白。老医生习惯沿用传统方法救治患者，但遇到新病症就无从下手。

新生儿窒息复苏培训让索南巴久看到了希望。2012年到2013年的两年间，青海省内及贵州、宁夏等地的儿科专家来到玉树，为当地基层医生现场讲授新生儿窒息复苏的救治方法。这次学习让索南巴久这样在高原上的医生第一次有了“新生儿救治理念”。

那次培训之后，索南巴久立刻投入新救治方法的学习，也萌生了建立新生儿救治体系的想法。“必须建立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如果我们有完善的救治设施设备，很多孩子就能存活下来！”

从2013年开始，索南巴久和同事着手谋划建立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他不断学习发达地区的治疗经验和救治模式，统计玉树州人民医院的新生儿死亡人数、分析病情和死亡原因、设想救治方案、设计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草图……一沓一沓分析报告、一张张亲手绘制的设计草图见证了索南巴久的努力。

在对口支援玉树的北京市的帮助下，2017年3月9日，玉树州首个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在玉树州人民医院建成投用，当月就成功救治26名危重新生儿，很多过去治不了的早产低体重、呼吸发育不健全等危重患儿得到成功救治，让草原上的家庭又有了希望。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建成一年多来，成了玉树州儿科医生最强壮的臂膀，辅助医生成功挽救了432名危重新生儿。但因为床位不足、医疗设备不够完善，也留下了不少遗憾。

今年，在北京市出资支持下，玉树州人民医院计划扩建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提升部分医疗设备。“能救活每一个患病的孩子，是我们儿科医生最大的梦想。”索南巴久说，现在医生有了救治能力，牧民老百姓不再像过去一样用迷信方式治病或是认命放弃，而是更相信医生，这就是他们最大的成就感，也是他坚持这一事业的动力。